



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 宗教哲学批判

20 SHIJI XIFANG WENHUA WEIJI
ZONGJIAO ZHEXUE JIPIAN

陈树林等◎著

20世纪西方文化危机 宗教哲学批判

陈树林等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宗教哲学批判/陈树林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316-5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宗教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7981 号

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宗教哲学批判

20 SHIJI XIFANG WENHUA WEIJI ZONGJIAO ZHEXUE PIPAN

陈树林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12316-5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人类困境与终极关怀	
——蒂利希文化神学思想研究	14
第一节 蒂利希的生平及思想特征	14
第二节 蒂利希宗教哲学的理论主题	24
第三节 西方文化危机的宗教哲学反思	47
第二章 社会精神基础建立与虚无主义批判	
——弗兰克社会哲学思想研究	61
第一节 建构社会哲学的时代背景 and 任务	61
第二节 社会哲学的基本理论内涵	69
第三节 弗兰克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	86
第三章 客体化的宗教哲学批判	
——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思想研究	95
第一节 别尔嘉耶夫的学思历程	95
第二节 客体化的理论内涵及其表现形态	99
第三节 末世论形而上学对客体化世界观的超越	127

第四章 人的缺失与整全的人文主义关怀

——马利坦的以神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研究 143

第一节 马利坦思想的社会背景与理论渊源 143

第二节 马利坦整全人文主义的内容 153

第三节 马利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局限性 174

第五章 上帝之死与责任伦理反思

——朋霍费尔的宗教哲学思想研究 180

第一节 朋霍费尔生平及思想简述 180

第二节 责任伦理：朋霍费尔神学中的现实关怀 182

第三节 对 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及其特点 204

第六章 社会失范的宗教哲学批判

——尼布尔基督教伦理现实主义思想研究 219

第一节 尼布尔的生平简介及其思想特征 219

第二节 基督教伦理现实主义理论主题 225

第三节 对社会失范的伦理批判 242

第七章 政治经济压迫的宗教哲学批判

——古铁雷斯的解放神学思想研究 267

第一节 解放神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267

第二节 古铁雷斯及其解放神学思想的中心议题 275

第三节 古铁雷斯解放神学的影响 302

第八章 当代生态危机的宗教哲学批判

——莫尔特曼生态创造论思想研究 307

第一节 莫尔特曼与当代生态危机 307

第二节 生态创造论生态观的基本内涵	315
第三节 生态创造论神学理论的特征	329
附录 文化模式中的宗教	351

参考文献	364
------------	-----

后 记	374
-----------	-----

然而，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危机批判思潮中，还有一种经常被大忽视的、处于边缘化或隐身在上述各种思潮中的、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宗教哲学批判。其批判主体既有职业的神学家，也有带有神学倾向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以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终极生存价值为理论主题，以实现人格革命、心灵革命或给人提供终极关怀为理论旨趣，使基督教哲学批判成为20世纪文化批判百花丛中的一枝奇葩，丰富了20世纪文化批判的景观。这种神学视角下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纯理性主义视域内文化批判的某些缺憾和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导 言

20 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纪，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西方世界也面临着深重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面对 20 世纪西方的文化危机，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在整个批判过程中，形成了以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卢卡奇、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德里达、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等几个主要流派。从宏观上看，上述三个流派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且这种家族相似性代表了 20 世纪西方文化批判的基本趋势。这些流派的共同特点在于，在检讨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时，大多局限于理性主义视阈内或只对理性主义危机加以批判和关注，而很少有超越理性主义路线对西方的文化危机做出深刻的、全方位的检讨和批判；在文化批判的旨趣上，这些流派的批判，大多是“只破不立”，或者“重破轻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要摧毁、瓦解、解构、消解由启蒙运动建立起来的理性主义理论体系或文化模式，而不是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文化模式。

然而，在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危机批判思潮中，还有一种经常被人忽视的、处于边缘化或隐含在上述各种思潮中的、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宗教哲学批判。其批判主体既有职业的神学家，也有带有神学倾向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以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现实生存处境为理论主题，以实现人格革命、心灵革命或给人提供终极关怀为理论旨趣。这种宗教哲学批判成为 20 世纪文化批判百花丛中的一枝奇葩，丰富了 20 世纪文化批判的景观；这种神学视角下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纯理性主义视域内文化批判的某些缺憾和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20 世纪宗教哲学批判的基本格局和理论依据

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它经历了宗教改革之后，昔日至尊至圣的神学家不再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已经不能和高扬理性的哲学家在争夺话语霸权上一争高低了。神学家在不断向哲学家交出自己的“权杖”和“领地”的同时也不甘寂寞，他们在不断重新自我定位、自我反思，在默默无闻中重建充满活力的神学思想体系。所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理性主义主导文化氛围中，即便有某种神学申辩和抗议，其声音也极其微弱，其作用并未被人们所重视。然而，20 世纪前后西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以及主流文化精神危机之后，历史却给了神学家们一次难得的机遇。许多神学家看到了复兴宗教神学的希望，在他们看来，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给他们宣布基督福音和重建“神律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神学家们从不同的神学立场展开了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工作，在对 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批判中形成了规模庞大、范围广泛、表现形态各异的宗教哲学批判、神学批判格局。

首先，从阵营构成上看，宗教哲学批判主体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既有像巴特、蒂利希、布尔特曼、朋霍费尔、拉纳、默茨、昆、古铁雷斯、莫尔特曼、考克斯、布鲁纳、尼布尔、马里坦、马塞尔、布伯等神学家，也有像雅斯贝尔斯、布洛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带有神学倾向和气质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这种不同的学术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宗教哲学批判在表现形式上丰富多彩、视角各异。

其次，从宗教哲学批判的态度上来看，既有自觉的、自发的宗教哲学和神学批判，也有不自觉的、后转向宗教哲学批判的。对于神学家而言，基本的神学立场决定了其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神学复兴的使命；对于某些哲学家、历史学家而言则不尽然，但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结局却是百川归海，他们最后都皈依到宗教哲学和神学的怀抱，尽管有些人是不自觉的，但结局却基本相同。

最后，从宗教哲学批判的表现形态上看，20 世纪的宗教哲学批判可谓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仅从神学家阵营内部来看，就形态各异。巴特代表的危机神学，古铁雷斯代表的解放神学，蒂利希代表的文化神学，布尔特曼、麦奎利代表的生存神学，默茨代表的实践神学，怀特海代表的过程神学，尼布尔代表的世俗神学，莫尔特曼代表的生态神学，柯布、格里芬代表的后现代神学以及女性神学、拉美黑人神学、政治神学、传统的保守神学等其表现形态和理论视角各不相同。从非神学阵营看，同样差别万千。雅斯贝尔斯的宗教哲学批判以存在主义哲学形式出现、布洛赫的宗教哲学批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式出现，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宗教哲学批判以历史哲学形式出现，韦伯的宗教哲学批判则是以社会学形式出现。

20 世纪宗教哲学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充分认识到，西方的文化危机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双重危机，仅仅医治其中的一种“疾病”，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病患”。当代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文化批判的不足之处，在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尽管他们煞费苦心，但结果却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由于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批判的主流话语中缺少对宗教危机进行批判和关注的一维，致使人的形象无法从根本上重新树立起来。同时，由于 20 世纪的文化批判视角过于分散，摧毁多于建构，像“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这些极具震撼力的结论对逻辑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等批判虽然非常尖锐、深刻，但是，这种批判、摧毁和解构的结果却令人茫然不知所措。20 世纪众多的文化批判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之中，难以形成有效的文化整合，因此导致人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从这一视角上看，20 世纪的哲学批判至多起到了暴露危机、展现困境、揭示根源的作用，对从根本上重建文化家园这一根基性工作尚缺乏有效建树。神学批判正是抓住了主流批判的这种弱点，展开了自己的宗教神学维度上的文化批判。

从总体上看，尽管宗教哲学批判阵容庞大、形态各异，但是其理论依据却基本一致。正是这种相同的理论依据，才使得从各自不同出发点的宗教哲学批判理论走到一起来。

首先，基督教神学的基本原则是宗教哲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尽

管 20 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传统的基督教有非常“自由的解释”，但他们认为基督教神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却不容变更，而且具有永恒的绝对真理性。蒂利希把这一“绝对真理”归结为三个根本思想原则：第一，“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善”，用《圣经》的神话表述为：上帝看见并关注着他所创造的一切，这就是善；第二，“普遍沉沦的思想”。沉沦意味着从这种本质的善转化成与自身分裂的实存状态，这种转化在活生生的人那里，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第三，“拯救的可能性”。^① 是指分裂的被治愈，或病态的康复。在蒂利希看来，上述三个思想是所有神学都承认的和遵循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天启真理”，这种真理是包括自由神学、生态神学、政治神学、解放神学、女性神学、基要神学、过程神学等在内的各种神学的理论前提，也是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历史哲学家的理论前提。神学家和某些哲学家们认为基督教这些天启真理揭示人的本质特性与人的实际生存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把握人的异化以及人的现实困境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进程的理论基础。

其次，基督教神学与现代西方社会之间具有同构性是宗教哲学批判的理论准绳。20 世纪的宗教哲学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神学教义和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双重解读与诠释，这种文化批判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除极少数保守的正统神学之外，绝大多数神学都对圣经教义作出了创造性的时代解释，并没有一味地用古板的圣经教义作标准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加以指摘。大多数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基本共识在于，认为基督教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社会并不矛盾，相反在本质上具有同构关系。具体而言，现代社会是对传统社会的继承，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现代体现，现代社会在本质上与基督教具有相同结构。蒂利希用神律、他律、自律概念对现代社会与基督教神学的关系进行了解答；汤因比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揭示了“大一统帝国”与“大一统教会”之间的内在关系；韦伯则用新教伦理与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合理性及其缺陷。正因为有了这种一致的理论准绳，神学批判

① 何光沪选编：《蒂利希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476 页。

才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旨趣——用基督教基本原则克服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一些弊端。

二、20 世纪宗教哲学批判的理论主题和切入点

一般说来，神学的基本问题是关于上帝的问题，但在 20 世纪的神学家们看来，神学的问题又恰恰是关于人自身的问题，具体说是关于人的生存困境问题。神学家们秉承传统神学主题——“人类的原罪和基督的代赎”，但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神学的理论视角和关注的问题透视到，宗教哲学批判关注的恰恰是 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困境，而非传统宗教对人的处境的直觉判断，其理论的轴心正是人的生存处境。

巴特断言，20 世纪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是“人的危机”，世俗的弊病已经达到一种危急关头，“人世已经变成了炼狱”。蒂利希从生存论角度剖析了人焦虑的本体性根源和无意义困境的内在根基，并从文化神学视角对人的异化困境、不平等困境、孤独困境、遗忘困境、环境困境等作了分析。雅斯贝尔斯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们所面临的任务，那么，这种精神状况就预示着人类的失败。别尔嘉耶夫把人的自由性、创造性的世界称为“精神王国”，把客体化、符号化、必然性的世界称为对人专制和奴役的“恺撒王国”，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备受奴役的恺撒王国时代。尽管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理论各有侧重点，但综合上述神学家们的观点则可以发现，他们的理论切入点具有某些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现代社会中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的异化和物化命运入手，进而对理性主义局限性展开批判。毋庸置疑，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异化和物化处境是每一个人的都无法逃脱的命运，而其罪恶的根源正是理性主义的现代表现——技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从总体上看，尽管科学技术有其危害的一面，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却远远大于其危害。因此，神学无法从正面与其交锋，

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对理性精神开战。

蒂利希在揭示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弊端时指出,“一种逻辑的或自然主义的机械论,它似乎摧毁了个人自由、个人决断和有机的共同性;一种分析的理性主义,它削弱生命的活力,把包括人本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变成计算和控制的对象;一种世俗化的人道主义,它把人和世界跟实存的创造源泉和终极奥义分割开来”^①。

别尔嘉耶夫则认为,“机器和技术使人的精神生活,首先是感情生活,人的各种感觉,遭受了可怕的失败。精神情感因素在现代文明中消失了……心脏很难承受与冰冷的金属的接触,它不能在金属的环境中生活。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便是作为灵魂的核心的心不断受到损害。一切都分解为智力因素和感性感觉……技术给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世界观以及人和文化的人道主义理想,带来了可怕的打击。就其本性而言,机器是反人道主义的”^②。

他还用“实体化”、“异化”、“客体化”,分析技术统治下的世界中人的生存境遇。他指出,“客体化是精神自由的丧失,虽然它所表现的是精神上的事。客体化的世界不是精神世界”^③。强调了精神性是不能理性地加以定义的,用理智来把握精神没有希望。

在马里坦看来,科学技术凭着自身并不能保障人类与幸福,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严峻的时代,科技的进步反过来危及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为了使科学的应用能给世界带来幸福而不带来毁灭,人类迫切地需要大力恢复智慧的训练,使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原理与文化重新结合起来……使科学与智慧取得协调”^④。简言之,也就是要用基督教精神指导科学技术的应用。

其次,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强调人的神人性,强调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重要性。神学家们的理论视点主要都集中于人的“精神本体”及其价值上,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或“精神本性”

① 何光沪选编:《蒂里希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65~466页。

② [俄]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 [俄]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④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13页。

当做人的最本质属性，认为摆脱人的生存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塑人的形象和进行人格革命和心灵革命。蒂利希主张通过人的形象重塑以彻底摆脱文化危机，进而从根本上克服人的生存困境；别尔嘉耶夫则主张通过人格的全面革命，摆脱旧的文化传统对人的统治。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的多维视角中，他们主要从对人性的分析或把握入手。在理论方法和理论来源上更多来源于基督教神学思想，在人生困境的出路上主要把希望指向精神、心灵的内在革命，在寻找人的最终归宿上，寄希望于宗教信仰。蒂利希从本体论角度剖析了人的三重本体，即生命本体、道德本体和精神本体，尽管蒂利希并没有否定生命本体的价值，但是，他认为人的本质特征在与人的精神性，对人而言，“精神本体”才是人的真正本体。蒂利希对人的形象的重塑和把人生困境的出路指向宗教信仰等所有理论建构都奠基于此。别尔嘉耶夫特别强调了人的精神的地位，而且把人的本性定位于人的精神性。他用“神人性”来说明人的精神特性，认为人之所以具有自由性、创造性及超越性，都根源于人的神人性。在别尔嘉耶夫思想中，对神人性的论述和强调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他认为，“对人而言，精神是真正的现实，是第一性的。相对于精神，客观世界是符号世界，也是“不完全的现实”。“在客体中，一切都是有条件的，一切都只有符号的性质，而不是现实本身。因此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微不足道的。世界历史中存在两种原则的对抗，即主观性、精神性、原始现实、自由、真、真理、爱、人性和客观性、宁静、决定论、从外面起作用、利益、结构、力量、权力的对抗。这也是神的王国与恺撒王国的斗争。神子与人子在这个世界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精神在客体化世界中受难，精神的客体化是对它的折磨。”^①

正因为他们把人的本质特征归结为人的精神性，因此，在选择人的解放道路上，强调人的精神超越和心灵革命。蒂利希主张人的形象的重塑，用爱、自由为原则，使人获得圣化，获得重生。别尔嘉耶夫主张实现彻底的“人格革命”，但是，他也充分认识到人格革

① [俄]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5 页。

命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指出人格主义革命将是一个比任何其他革命更加困难、在时间上更加漫长的过程。尽管如此，“但这将是真正的人的革命，人和上帝将在其中融合。在这种革命中，神人，也即有人性的人，将是胜利者。人没有人性，神则是有人性的，人性是上帝的基本属性。人根植于上帝之中，就像上帝根植于人之中一样。”^①

别尔嘉耶夫说：“真正的新人的出现，而不是只改变服装，要求以精神上的发展和改变为前提条件。没有内在的精神性核心和在其中发生的创造过程的存在，任何新社会制度都不会造就新人。”^② 对人而言是这样，对人的生命活动同样如此，他认为，“新生活是不能仅仅从自然主义或社会出发去想象的，需要从精神出发去思考它。但是精神既接受自然生活，也接受社会生活，赋予生活以意义及整体性、自由和永恒，战胜一切未贯穿精神性的东西都注定要经历的死亡与腐烂……纯粹的得到解放的精神是主体化，也即向纯存在领域的过渡。客体化世界能够被人的创造性努力所摧毁，但这仅仅是因为在这种创造性的努力中上帝将发挥作用。”^③

再次，对人类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等进行批判，进而强调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种和谐的、充满爱和欢乐的、平等的、节制的、合理的世界。马利坦指出，“一种野蛮的和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毁灭人的人道主义取代了基督教哲学的完整的人道主义的地位。反神学的理性主义者在哲学的伪装下篡夺了思想的神圣地位，并最终使人类成为智慧的孤儿”^④。他认为，完整的人道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将承认人的理性部分，使它服从理性，同时也承认人的超理性部分，使理性受它的鼓舞，使人敞开胸怀接受神性的降临”^⑤。对于完整的人道主义来说，

① [俄]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7 页。

② [俄]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8 页。

③ [俄]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6~267 页。

④ [法] 马利坦：《科学与智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0 页。

⑤ 傅乐安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 宗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5 页。

“现代文明是一件穿破了的衣裳，我们不能在它上面补上新的布片，我们可以说，它需要一次整体的、实质性的改铸，需要对文化原则重新评价”^①。马利坦认为现代危机是由于世俗人道主义的盛行带来的，这种人道主义使得人神分离，这样一种思想病，把世界带入了黑暗。

尼布尔把现代人的罪恶归结为“骄傲”和“纵欲”两种，现代人“相信自己为生存的主宰，命运的支配者和价值的裁判者”^②。

最后，强调“意义世界”是人生存的真正根基。20世纪的神学家们的共同感受是，认为现代社会缺乏意义世界。

朋霍费尔指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向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③。蒂利希把人的生存根基指向意义世界，强调绝对信仰、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对人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陷入分裂的原因是缺乏能够体现对人具有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的“精神中心”（spiritual centre）。他指出“除非‘中心’在本质上是精神上的，否则就不能统一整个社会。……‘精神’是群体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意义与力量，而不只是意义而已”^④。探索“意义”和“永恒”成为别尔嘉耶夫生活的强大动力，他的人生的第一次转向就是向探求真理和意义的转变，他把探索真理和意义与日常现象、无意义的现实性对立起来，认为他的这次转向不是转向东正教或基督教，而是转向精神方面。他坚信，“即使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但探索意义已经赋予生命以意义，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这种意义的探索”^⑤。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在灵魂深处，在比理性理论更深的层次上，我相信精神是第一性的现实性，而外在的、被称为‘客观的’世界、自然的和历史的世界则仅仅是第二性的、反映的、象征一符

① 傅乐安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六卷 宗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②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③ [德]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④ 刘小枫编：《当代政治神学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⑤ [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转》，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6页。

号性的现实性。这种世界观即使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也仍然保留着”^①。他认为，“人的存在的秘密就在这里：人的存在证明着某种高于人的东西存在，人的优点也在于此。人是克服着自己的局限性向最高存在物超越的生命物。如果没有作为真理和意义的上帝，没有最高的真理，一切都将成为平面的，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谁是人向之提升接近的。”^②“如果没有上帝，没有高踞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整个地服从于必然性或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从人身上的精神的存在中体现出来。”^③ 总之，尽管神学家们的理论切入点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批判主题却基本一致。

三、20 世纪文化危机宗教哲学批判的理论价值

尽管 20 世纪的宗教哲学批判处于容易被人忽视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其批判主体、批判视角、批判的理论基础都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世界之中，同时批判的主体又与人的现实生存紧紧相连，显示出宗教哲学批判与哲学社会批判相竞争的态势。正如利文斯顿所言，“在过去 300 年间，尽管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日益增长的世俗化倾向，基督教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恢复能力和创造能力。在那失败的黑暗时代，在那可鄙地向世俗主义投降的黑暗时代，基督教跌倒了，可是这些时期却有充满活力的神学上的反应作为抵偿，这些神学上的反应拒绝单纯靠拢和坚持古代的立场。”^④ 宗教哲学的恢复和创造能力在 20 世纪愈发强劲，神学家们无法忍受神学沦落在遗忘之乡的颓势，坚信“基督神学的逻各斯绝非是一个无主体和无历史的理念，它根植于一种思念之中，这种思念不可能消除、忘却或从理念上抵

① [俄] 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转》，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76 页。

② [俄]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21 页。

③ [俄] 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周靖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1 页。

④ [美]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94 页。

消人的受难史”^①。蒂利希、默茨、古铁雷斯等人的神学批判都体现了这种实践神学的精神。因而，宗教哲学的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20 世纪文化危机的宗教哲学批判无疑向人们指出了摆脱文化危机的另一条道路——宗教神学路线。在理性主义特别是技术理性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在宗教信仰边缘化和微弱化的时代，在科学技术高度繁荣昌盛的时代，宗教哲学批判能够利用时代提供的现实契机和一切理论资源向人们表明宗教神学路线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纯理性主义路线的理论不足和思想偏差，极大地丰富了 20 世纪文化批判的理论色彩。审视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并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思想源头，恰恰相反，正是这两个源头流淌出的思想活水的相互融合才滋润和哺育了西方文化的生长。两大思想源头代表的两种文化精神若能够相互融合、和谐相处，生活在西方的文化家园中的人就充满着欢乐、安宁和幸福；两种文化精神若处于分裂状态，人的生存活动就陷入不幸、混乱和焦虑的困境之中。因此，从思想和理论上整合两种文化精神就成了各个时代哲学家的神圣使命。神学家们在对原有的传统观念、理论、命题作全新的解释基础上，对理性与信仰、宗教与文化、世俗与教会、有神论与无神论、科学与宗教等传统命题作了现代的解释和综合，力图寻找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文化精神的切合点。他们认为，建立以神律文化模式统摄下的自律文化和他律文化才是西方人得以生存的文化家园，有着“神律”关照的“自律”社会才是得到“终极关怀”的社会，沐浴着“神圣之爱”的人才是自由和欢乐的人。

第二，20 世纪西方文化危机的宗教哲学批判的理论深度是极为深刻的。他们抓住了文化危机的核心，即人的生存意义的危机。一种理论批判的深刻程度取决于对批判对象把握的准确程度。神学家们同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一样深深地体会到这种深刻的文化危机并对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神学诊断。神学家们把西方文化危机总体

① [德] 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朱雁冰译，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五版序，第 4 页。